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Anniversary Edition

二十世纪
西方文学理论

(纪念版)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伍晓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Anniversary Edition

二十世纪
西方文学理论

(纪念版)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伍晓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58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纪念版 / (英)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著；伍晓明译.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

(博雅文学译丛)

ISBN 978-7-301-29291-4

I.①二… II.①特… ②伍… III.①文学理论—西方国家—20世纪 IV.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2213 号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Revised Edition, Anniversary Edition by Terry Eagleton,
ISBN:978-1-4051-7921-8

Copyright ©1983,1996,2008 by Terry Eagleto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 书 名**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纪念版)
ERSHI SHIJI XIFANG WENXUE LILUN
- 著作责任者** (英)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著 伍晓明 译
- 责任编辑** 张文礼 张凤珠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291-4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97 千字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 2018 年 5 月第 2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为我的老师乐黛云
这一翻译最初即因她之嘱而成

中译本新版译者前言

本书原据英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伊格尔顿初版于1983年的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译出。中译本以《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为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初版，1987年再版。初版距今已整整20年之久。此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获英国 Blackwell 出版公司授权重新出版前，我根据伊格尔顿此书1996年的第二版对原来的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仔细修订，增加了若干译者注释，并译出了作者为其第二版所专写的长篇《后记》。此《后记》意在概括其书初版13年来西方文学理论领域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不啻为原书的某种续篇，而其中的注释则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学理论发展情况的极其详尽的参考书目。

本中译本原来的译后记中简单介绍过伊格尔顿的生平。20年后的今天，似乎需要对之再补充数语。我当时描述伊格尔顿的批评观点为“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现在看来，他的思想已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他试图将威廉姆斯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他自己所受之罗马天主教教育中的那些价值观念调和起来。5年以后，他拒绝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转而提倡某种阿尔都塞式的“文本科学”（science of the text）。是为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5年以后，他的思想又为之一变。此次他明确地转而提倡“革命批评”，其目标是使文学研究最终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本书1996年出第二版时，伊格尔顿尚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任教。他目前则任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美研究系。

本书中译本的初版实为我在理论翻译上的“少作”。20年后的今日，

竟有可能将其加以仔细修订而重新出版，我深以为幸，因为这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改正过去的误读与误译的机会。着手修订前，确曾不无惶恐，以为定会于其中发现不少令我汗颜之处。所幸情况其实并非如此。今日重新读来，觉得当年的翻译基本仍可接受。所以，虽然确是做了逐字逐句的认真校对，但改动却并非很多。当然，假如让我今天完全重新翻译此书，其译文风格当会有所不同。此不同读者也许能于正文与后记之间在译文风格上的某些差异而窥见一二。本书中译本原来所取的书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当年广为读者所知，所以现在也一仍其旧，尽管本书书名的直译应为《文学理论导论》。我为中译本初版所写的译后记也基本原封附上，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似乎应该再重写一篇才是。但窃以为此译后记仍能为读者提供一些信息，并且也带着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就让我把它也在这里保存下来吧，尽管我现在对这篇后记已经并不满意了。

没有我的老师乐黛云，我是不会开始翻译这本书的，这本曾在那个渴望新鲜文学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为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带来了可贵的西方信息的文学理论著作。是乐黛云老师，结束其在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访问学者工作之后，刚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即嘱我翻译此书，意在为当时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教学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如果本译本在当年起到了它的独特的作用，并将会继续保持为一部有用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那么乐黛云老师应该是首先被感谢者。

在修订译文过程中，承蒙坎特伯雷大学 Denis Walker 博士为我解释若干疑难，其劳不可不记；首都师范大学庄美芝将她对包括拙译在内的三个中译本的前二十几页的译文所做的比较提供给我参考，亦不无小补。在此一并致谢。

虽已经仔细修订，错误仍当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教正。

伍晓明

2006年2月10日于坎特伯雷大学

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序言

这本书的年纪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但如果它的牙口似乎比这个年纪还稍微要更老一些^[1]，那也许是因为，自其问世以来，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其中的一件已发生之事就是，文学理论不再像25年前那样占有居高临下的地位了。本书最初写成时，理论就像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一样，新颖，陌生，危险，神秘，而且激动人心。有些学生仍然不无道理地觉得，文学理论还是一如既往地完全如此；但正如现代主义艺术所产生的冲击力量最终被吸收，直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说过的——开始显得完全就是个合乎成规的故事，理论也不再像它曾经那样是稀奇古怪之事了。确实，就像我在本书后记中提到的，我们近来已经目睹了对于理论的某种抵抗(anti-theory)，尽管这种抵抗本身也与理论兴趣有关。在这一点上，这种对于理论的抵抗有别于通常那些对于理论的出于市侩之见的拒绝。这些拒绝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某种敌意，而不是某种论据。

那么，理论已经被“制度化”了吗？我想，如果将“制度化”一词（此词带有注射器和紧身衣这样的险恶含义）视为纯粹的贬义词^[2]，

[1] “牙口……老”(long in the tooth)，这本来是说马的。马老了牙龈就会萎缩，使牙齿显得更长。汉语中用于谈论牲口年龄的“牙口”一词也是这个意思。通过使用这一俚语，作者将本书幽默地比为一匹服役已久的老马。

[2] 英语“institutionalize”有两义：一、将病人、老人以及尤其是精神病人收入医院、养老院或精神病院；二、将某种事物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将其加以制度化。作者此处一语双关：文学理论变成学院的常规科目有似精神病人被收入精神病院，文中括号里提到的注射器和紧身衣即隐指后者。

这一问题就无法恰当地回答。理论如今在学术机构中被广泛地教授，这是应该得到赞许之事，而不应作为某种卑劣的屈服而遭受谴责。自从我1970年代早期在牛津大学的一个非正式研讨班上每周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来，事情在这一方面已经变好了很多。那个研讨班当时甚至都没有在大学课程名单上得到广告，而且还遭到我的同事们的广泛反对；那个研讨班进行得不那么像一个正统的研讨班，而更像一个为那些在意识形态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学生们提供的避难所。如今大部分学习文学的学生却都可以期待总有一到两门理论课可选，这已经成了司空见惯地受到欢迎之事。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许确实是某种屈服，或至少也是某种令人不安的妥协，因为理论从未仅仅意在作为吸引那些在知识市场上花钱的顾客们的又一种产品而与那些教授伟大经典的课程并肩而立。这样看待理论就是误解理论之何以为理论。在其最佳状态中，理论向其他这些知识追求提出问题，而不是作为诸种选项之一而与这些知识追求温顺地共存。它并不单纯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各种新的方法，而是去探究文学本身和文学制度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它并不供给我们对付经典文本的各种更加精致复杂的方法，而是去探究经典性这一概念本身。它的目的并非只是帮助我们看到文学作品表达什么意义，或文学作品如何有价值；相反，它首先质疑我们有关“表达意义”本身又是什么的各种常识性观念，并对于我们用以判断文学艺术之价值的标准提出问题。将一门理论课与一门讲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月亮象征的课放在一起，就是犯了哲学家会说的某种范畴错误。那就像是把马克思主义也简单地作为社会学的一种来学习，而不是去抓住马克思主义除了别的以外同时也是对于社会学这一概念本身的一种批判这个要点。学术界由于其结构本身就倾向于鼓励这类概念错误。就像市场一样，学术界有时也把不可比较的东西并排摆在一起。

因而，如果确切地理解，文学理论就是某种关于话语的话语（*meta-discourse*）。文学理论并不作为谈论文学的诸种方式之一而出现，而是对其他各种形式的批评分析采取一种批判姿态。它尤其倾向于怀疑这

些批评分析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在回避问题。批评家们可能会问某一特定的叙述特技是否有效，但叙事学家们则首先就要知道这个叫作叙事的奇怪动物是什么，而且不愿意被我们所具有的那种认为人人看见一个故事时都能认识那是一个故事的直观感觉所欺骗。如果批评家，比如说，去在一部小说中辨别荣格心理学中的一些模式，那么理论家则热心于知道“小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能被定义吗？一部短的长篇小说与一篇长的短篇小说/故事如何不同？批评家们可以争论奥斯卡·王尔德到底是大家作家还是小作家，理论家们则宁愿首先调查我们借以做出这些判断的那些（经常是无意识的）规范和标准。所有阅读都要求解释，但诠释学家则探究我们进行解释时所发生的是什麼。一个批评家可能会谈论一个文学人物的无意识，一个理论家则更可能首先去问“人物”是什么，以及文本是否也能有某种无意识。

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是，人们可能会冒险称之为“纯粹”或“高端”理论的东西不再那么流行了。对于符号学、诠释学、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谈论不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么多了。甚至精神分析理论，尽管其所具有的种种魔力和诱惑，也不像以前那样地位显赫了。相反，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已经与变弱但却继续存在着的女性主义一道夺取了这一学科的各个指挥高地。这是很有意思的演变，因为这种情况所表示的，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乃是一种从纯粹理论的空气稀薄的山顶向着日常文化的波谷和平原的转移。同样的说法可能也适合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繁荣一时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皆远不止于是文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纯粹理论的情况，因为纯粹理论中实际上极少有什么是在文学竞技场中起源的。现象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是哲学潮流，精神分析是治疗实践，符号学是有关符号的一般科学，而不仅仅是有关文学符号的科学。新历史主义试图抹去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就像结构主义在它的年代里也曾做过的那样。尽管如此，一口气同时谈论诸如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符号学和后殖民主义，就是又一个范畴错误。这两对术语各自之中的前者是理论实体，各自之中的后者则是文化和政治现

实。将它们想象为或多或少是同样的事情，那就会像是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跟全球变暖是同样种类的事情一样。这同样也是学术界有时引诱我们去犯的那类错误。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向着日常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回归显然是应该受到欢迎之事。然而，像往常一样，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纯粹理论可能有其问题，但纯粹理论与日常之事拉开的那一距离容许纯粹理论经常成为对于日常之事的一种有力批判。这一思想中的大部分事实上都有一个隐而不显的乌托邦层面。后结构主义梦想有朝一日那些僵硬的等级和那些压迫人的两极对立将被撬开，从而释放出一种差异与多样化的游戏。无论解释活动中包含什么滑动游移，诠释学继续保持着其对人类理解的可能性的信念。接受理论，带着它的隐含的“更多权力归读者！”的口号，寻求将读者从批评家们迄今为止一直分配给他们的被动地、温顺地遵从作品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并将读者视为主动者和共同创造者。在这一理论潮流背后，1960年代学生运动提出的那些要求依稀可见。

大部分后现代主义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确，后现代主义有激进的一翼，但对于那些更加志得意满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说，多元主义、多元文化和对于各种人类差异的尊重大约差不多就是一切了。但在一个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迫使全世界就范的世界上，这很难被视为一种充分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则是一方面拒绝从社会和政治撤退到“话语”之中，另一方面也拒绝与我们所知的社会存在进行一种玩世不恭的或自甘失败的共谋。其他形式的政治批评，例如后殖民主义，于是就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来评判。有些后殖民思想潮流将全球权力和资源划分视为理所当然，反而将自身局限于认同与种族问题。但也有些更有前途的后殖民思想类型表现着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批判在当下的坚持不懈，无论这些分析需要怎样根据那被有些人乐观地称为晚期资本主义之物而做出修正。

我希望本书于其25周年之际的再版将有助于重温本书写作之时理论所能鼓舞起来的那种强烈激动。如果本书之继续流行可以告诉我们任

何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激动之潮还绝对没有退去。我不知道对下述之事究竟是应该高兴还是生气：《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竟成为美国所有名的商学院的学习科目，因为这所商学院好奇地想要发现一部学术文本如何竟能变成一本畅销书。

特·伊

2007

第二版序

本书是使现代文学理论对于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变得可以理解并且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尝试。自其1983年问世以来，我可以欣喜地报告说，已经研究过这本书的不仅有文学批评家们，而且也有律师们，不仅有文化理论家们，而且也有人类学家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并非全然令人吃惊。这本书所欲证明的正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中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simply*）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本书之所以流行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值得新版的一个原因。不过，我也为本书所吸引的非学术性读者所动。与绝大多数这类作品不同，本书已经做到了达于学术界以外的读者，而这从文学理论的所谓精英性来看就尤其意味深长。如果说文学理论是一种困难的甚至是奥秘的（*esoteric*）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却似乎是一种让从来没有见过大学内部的人感兴趣的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学里面那些因其奥秘性（*esotericism*）而打发掉它的人就应该再想一想了。无论如何，在一个期待着意义就像其他一切那样可以被立即消费的后现代，还有着那些发现值得努力去获得一些谈论文学的新方式的人，这是令人鼓舞的。

有些文学理论确实过分地圈子化并有意晦涩，而本书则代表了化解由此而起的损害，并使文学理论更加容易接近的一个尝试。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样的理论也恰是精英主义的反面。在文学研究中，真

正的精英主义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文学作品只能为那些具有某种特定文化教养的人所欣赏。有骨子里就有“种种文学价值标准”的人，也有在文学之外的黑暗中苦苦渴望的人。自19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所谓“无文化教养的”(uncultivated)环境的不同新型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冲击了此种假定，致使其逐渐崩溃。理论是将文学作品从“文明化的感受力”(civilized sensibility)对其的遏制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开放于一种至少原则上人人都能参加的分析的方法之一。奇怪的是，那些抱怨此种理论之困难的人，常常并不期待自己一下子就读懂一本生物学或化学工程学的教科书。为什么文学研究就应该与此有任何不同呢？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期待着文学本身是一种对任何人都立即唾手可得的“普通”语言吧。正确理解的文学理论是由民主的激力而不是精英的激力所形成的。就此而言，如果文学理论确实沦为不可卒读的华而不实之辞，那它就背离了它自身的历史起源。

序

想为 20 世纪中发生于文学理论的变化各个开端确定一个日期的人，可以比决定其为 1917 年做得更糟。^[1]就在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发表了他那篇开拓性的论文《作为手段的艺术》（Art as Device）。从那时起，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文学理论数量激增，“文学”（literature）、“阅读”（reading）和“批评”（criticism）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个理论革命的大部分成果尚未超出专家和热心者的小圈子：它尚待于充分影响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

本书打算向那些以前没有或几乎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较为全面地阐述现代文学理论。虽然这样的介绍显然会有省略和过分简化之处，但我力图做到的是使这一学科通俗化而不是庸俗化。既然我认为“中立地”、不含价值判断地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在阐明某一论点，我希望这将增加本书的兴味。

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曾经说过，那些厌恶理论或者声称没有理论更好的经济学家们只不过是在为更古老的理论所控制而已。对于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来说，情况是同样的。有些人抱怨文学理论过于深奥难懂，疑心它是某种神秘知识，是一个有些近似于核物理学的专家领域。的确，“文学教育”并不鼓励分析思想；但是，文学理论实际上也并不比许多理论研究更困难，而且比有些理论研究还要容易得多。我

[1] 作者的意思是，这些开端的准确日期不易确定，而将其定为 1917 年比定为其他日期可能还稍好一些。——译注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那些害怕这一学科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人消除神秘感。有些学者与批评家也反对文学理论“介入读者与作品之间”。对于这种反对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即如果没有某种理论——无论其如何不自觉地其为理论或隐而不显——我们首先就不会知道“文学作品”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阅读它。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除这种压抑并使我们记住这一点。

特里·伊格尔顿

目 录

中译本新版译者前言 / 001

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序言 / 003

第二版序 / 008

序 / 010

导言：文学是什么？ / 001

一 英国文学的兴起 / 017

二 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 057

三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 095

四 后结构主义 / 135

五 精神分析 / 161

结论：政治批评 / 212

后 记 / 238

参考书目 / 266

索 引 / 275

中外人名对照表 / 296

中译本初版译后记 / 306

导言：文学是什么？

如果存在着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似乎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叫作文学的东西，以作为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开始本书：文学是什么？

有过各式各样定义文学的尝试。例如，你可以将其定义为虚构（fiction）意义上的“想象性”（imaginative）写作——一种并非在字面意义上追求真实的写作。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人们通常用文学这一标题所概括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定义是行不通的。17世纪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Shakespeare）、韦伯斯特（Webster）、马维尔（Marvell）和弥尔顿（Milton）；但是它也延伸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论文、邓恩（John Donne）的布道辞、班扬（Bunyan）的精神自传，以及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所写的无论什么东西。在必要时，人们甚至可能用文学包括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或克拉仁登（Clarendon）的《反叛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17世纪的法国文学除了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以外，还包括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博絮埃（Bossuet）的悼词、布瓦洛（Boileau）的诗学、萨维尼夫人（Madame de Savigne）写给女儿的书信和笛卡尔（Descartes）与帕斯卡尔（Pascal）的哲学。19世纪英国文学通常包括兰姆（Lamb）（但却不包括边沁〔Bentham〕）、麦考莱（Macaulay）（但却不包括马克思〔Marx〕）、穆尔（Mill）（但却不包括达尔文〔Darwin〕或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因此，“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区分对于我们似乎并